

从保障兜底到发展赋能：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苏 炼, 莫伟豪, 张子萱, 田 静, 巩元勇*

攀枝花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 四川 攀枝花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高校资助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抓手, 正经历由“保障型资助”向“保障与发展并重”的范式转型。当前, 资助育人不再局限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物质匮乏问题, 不仅承担经济解困的底线功能, 更肩负价值引领、扶志扶智、人格培育、能力提升的综合育人使命, 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培育时代新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载体。当前实践场域中还存在资助与育人“两张皮”现象未能得到根本破解、精准识别面临隐性贫困与相对贫困带来的现实阻滞、多元协同育人机制运转不畅、数字化赋能深度不足、育人成效评价体系不完善、受助学生心理关怀与主体性培育缺位等多重现实问题。立足发展型资助核心理念, 应当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导向, 从强化价值引领、完善全链条精准资助运行体系、构建多方联动的多元协同育人生态、推进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智慧资助、健全闭环式成效评价与风险防控机制五个维度综合施策, 兼顾物质帮扶、心理疏导、能力培养与精神塑造, 真正实现“扶困、扶智、扶志”有机统一, 推动高校资助育人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高校, 资助育人, 发展型资助, 立德树人, 精准资助

From Security Support to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Logic, Dilemma and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Aided Education

Lian Su, Weihao Mo, Zixuan Zhang, Jing Tian, Yuanyong Gong*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chool of Agriculture),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苏炼, 莫伟豪, 张子萱, 田静, 巩元勇. 从保障兜底到发展赋能: 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127-134. DOI: 10.12677/ass.2026.1510821

Abstract

University student-aided education is a key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safeguard educational equity, which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security-oriented funding” to “equal emphasis 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urrently, student-aided education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addressing material deprivation among stud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t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bottom-line function of relieving economic pressure, but also shoulders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missions including value guidance, aspiration-wisdom cultivation, personality shaping and capacity improvement. It serves as a vital institutional carri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cultivating new-era talent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education governance. Nevertheless, practical challenges remain: the long-standing separation between financial support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s hindered by hidden and relative poverty;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perate inefficiently; digital empowerment is insuffici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educational outcomes needs impro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care as well as subjectivity cultivation for aided students are inadequate.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funding,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value guidance, optimizing the whole-chain precise funding system, construct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ecosystem, promoting in-depth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smart student aid, and establishing closed-loop outcome evaluation together with risk prevention-control mechanism. Balancing mater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training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universities can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verty relief,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and aspiration cultivation, so as to promote higher-quality and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aided educ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Aided Education, Development-Oriented Funding,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Precise Fund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生资助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安排[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诉求已经从“能够入学读书”升级为“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实现个人成长成才”，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内涵持续拓展，工作重心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难题，转向促进受助学生全面成长成才，“资助”是手段，“育人”才是根本目标[2]。《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对资源匮乏群体主体性困境的白描式刻画，为高校审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困境提供重要现实镜鉴：物质匮乏往往伴随发展资源不足、社会资本有限、成长迷茫、主体性弱化等连锁问题。高校资助育人不能简单停留在物质帮扶层面，更要守护学生发展主体性，重建成长信心，破解发展困境，避免受助学生陷入“物质脱困而精

神依旧弱势”的处境[3]。

新时代背景下,国内学界围绕资助育人内涵阐释、模式建构、精准认定、数字化转型、协同机制、成效评估等主题开展大量实证调研与理论思辨研究,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苑仁慧、陈红翠提出“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资源协同”三维协同框架,构建“识别-帮扶-发展-评价”闭环运行机制,为资助育人体系系统化建设提供重要理论参考[4];韩霞等选取北京、上海、浙江三地多所高校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实证分析证实资助规模结构、校园资助环境会显著影响资助育人实效,学生个人内在取向在政策发挥作用路径中承担中介角色,要提升育人质量必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建设[5]。部分学者从亲社会行为、政治信任等角度检验资助政策的德育外溢效应,揭示不同资助类型育人效果的异质性[6][7];也有研究立足治理现代化、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资助育人改革路径[8][9]。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完成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建构、单一思辨向实证检验的转向,但部分研究对受助学生的精神世界、隐性贫困问题、资助伦理风险讨论尚不够充分。现实办学场景中,部分高校仍然存在重资金发放、轻思想引领,重流程管理、轻个体发展的实践偏向,资助资源投入与育人产出之间尚未完全匹配,制约资助育人综合价值充分释放。本文立足已有研究成果,系统梳理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四重内在逻辑,深度剖析实践场域多重现实困境,探索契合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转型要求的可操作实践路径,以期高校资助育人改革提供参考。

2. 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2.1. 价值逻辑：坚守立德树人，推动教育公平由机会公平迈向发展公平

立德树人是高校资助育人的根本遵循,资助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承载价值引领、品格塑造、精神培育的德育功能[8][10]。资助育人区别于一般社会慈善救助,其教育属性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帮扶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11]。李春玲等基于全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发现,高校学生资助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受助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在培育利他奉献品德方面取得明显立德树人成效,但不同资助类型的育人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助困资助和自励资助更有利于培育无私奉献精神,奖励型资助更多增强学生理性利他意识,政策引导型资助则容易诱发理性利己倾向[6]。该结论充分说明,仅仅依靠资金投入无法自动实现德育目标,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场景创设强化资助的德育导向。

资助育人首先通过经济兜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起点层面的教育公平;更进一步,则要通过学业支持、心理关怀、实践平台供给弥补困难学生家庭资源短板,推动教育公平从传统“机会公平”进阶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公平”[12]。在这一过程中,资助体系承担培育学生感恩意识、诚信品格、责任观念与家国情怀的功能,引导受助学生树立自立自强的奋斗观念,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担当的统一[2]。

2.2. 范式逻辑：从保障型资助转向发展型资助，实现输血向造血转变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高校资助政策先后历经普惠型资助、奖助并存、多元资助体系、创新发展型资助四个演进阶段,资助理念也随之迭代更新[12]。传统保障型资助以解决学生就生存问题为核心,重点完成“输血式”经济兜底,核心目标是保障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原因辍学;而发展型资助坚持“扶困”与“扶志”“扶智”相统一,将学业提升、素质拓展、心理关怀、就业创业、思想道德培育全部纳入资助工作范畴,工作重心由解决生存难题转向赋能学生长远发展,着力提升受助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

发展型资助强调受助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再将学生视作被动接受帮扶的对象,而是鼓励学生参与勤工助学、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在受助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邝洪波、孙宗瑞提出的“六维一体”资助育人模式,将思想引领、道德浸润、学业发展、素质提升、精神激励、就业创新融为一体,正是发展型资助范式的典型实践表达。发展型资助并非否定保障型资助的兜底价值,而是在筑牢物质底线基础之上拓展育人边界,实现兜底保障与发展赋能的有机结合[12]。

2.3. 治理逻辑:推进资助治理现代化,构建多元协同的资助育人生态

高校资助育人不是学生工作部门单一主体可以完成的业务,而是一项涉及政府、高校、家庭、社会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资助治理现代化要求坚持协同化、精准化、人本化、制度化、效益化的治理特征,推动多方力量联动,打破校内部门壁垒与校际边界,整合分散的育人资源,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肖慧从协同思维视角指出,资助育人必须贯彻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做到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相契合,搭建共建共享协同平台,推动各个育人主体功能耦合,避免育人工作碎片化运行。

从校内治理维度看,资助育人不能完全压在辅导员群体身上,需要教务、就业指导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各院系、专业课教师、后勤管理部门共同参与;从校外治理维度看,政府承担政策统筹、制度设计、财政投入职能,家庭需要发挥家庭教育与情感支持作用,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可以提供资金、实习岗位、职业指导等资源支持[4]。当前部分高校资助工作陷入“学工单打独斗”困境,根源就在于治理体系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多元主体权责划分不清晰,协同激励机制缺失,造成育人力量分散、资源浪费。

2.4. 技术逻辑:数字赋能驱动智慧资助转型,兼顾效率提升与伦理约束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资助育人提质增效提供全新工具,推动资助业务从传统人工模式向智慧资助模式转型[12]。姜庆华、袁旭元构建价值-治理-服务三维分析框架阐释资助育人数字化转型:在价值层面实现从单纯物质帮扶转向聚力学生全面发展;在治理层面实现从单一组织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服务层面实现从简单业务数字化升级为智能服务供给[9]。

数据驱动下的智慧资助,能够有效缓解传统民主评议模式主观性强、人情干扰等痛点,助力识别容易被忽略的隐性困难学生,对学生家庭情况、学业动态开展常态化监测,为分类识别、个性化施策提供客观参考依据[12]。但技术只是工具,不能替代人的判断。在运用大数据开展资助工作时,必须兼顾数据伦理与学生隐私保护,警惕过度依赖消费数据标签化学生,防范技术滥用带来的二次心理伤害,做到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二者并重[6]。

3. 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理念层面:资助与育人存在“两张皮”,价值引领与精神关怀供给不足

部分高校仍然固守“重经济帮扶、轻精神培育”的传统工作思维,将资助工作简化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奖助学金评审、资金发放、档案整理等行政事务,德育价值未能充分嵌入资助全流程[8]。一方面,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劳动教育融入资助环节流于形式,大多依靠主题班会、集中宣讲开展,缺少场景化实践载体。部分学生对资助政策认知出现偏差,错误将资助视为理所应当的福利,出现申请材料不实、隐瞒家庭收入等诚信风险;部分受助学生接受资助之后缺少感恩回馈意识,诚信教育与资助业务融合深度不足[13]。另一方面,思想引领工作与学生真实成长场景脱节,对受助学生自卑敏感、社交焦虑、发展迷茫等深层次精神困境回应不足,经济实现解困,精神层面依旧存在困境,物质帮扶与精神解困不同步[10]。正如王燕凝研究所揭示,资源匮乏群体普遍存在主体性困境,部分受助学生在学业规划、自我认同、

生涯发展方面存在短板，现有帮扶体系对学生主体性重建关注明显不足[3]。

3.2. 识别层面：精准资助存在多重阻滞，相对贫困、隐性贫困识别难度加大

精准认定是开展精准资助育人的逻辑起点。时代变迁背景下，高校困难学生群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已经由特征明显的绝对贫困为主转向大量相对贫困、隐性贫困并存的格局，给认定工作带来巨大挑战[12]。第一，跨部门数据共享壁垒尚未完全打通，民政、乡村振兴、残联、医保等外部政务数据与校内教务、学工系统数据对接不畅，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难以依靠多源信息交叉核验学生家庭真实困难程度[14]。第二，认定工具各有局限：单纯依靠校园消费数据容易造成误判，家庭节俭、消费习惯差异会干扰判断结果；传统班级民主评议容易受到人情、人际关系影响，同时会造成学生家庭情况公开，伤害学生自尊，难以同时兼顾客观公正与人文保护[6]。第三，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部分高校困难学生数据库以静态年度认定为主，更新迭代滞后，无法及时捕捉学生家庭突发变故、家庭成员重病、自然灾害致困等动态变化，容易出现应助未助、错助漏助等资源错配现象[14]。

3.3. 运行层面：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育人资源碎片化现象突出

协同育人实践中，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资源协同三个维度均存在现实短板[4]。从校内运行看，资助工作主要落在学生工作部门与一线辅导员肩上，专业课教师、教务管理、就业服务、心理中心等部门参与资助育人的渠道有限、激励不足；学业帮扶、心理疏导、就业能力提升与资助业务相互割裂，拿到奖助学金的学生未必能够同步获得学业辅导与心理支持[15]。从校外维度看，政府统筹、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完整育人生态尚未完全成熟，不少社会资助项目仅仅完成资金拨付，没有配套学业指导、实习实践、励志教育等育人环节，社会资助的育人价值被闲置[14]。家庭层面，部分困难家庭本身存在家庭教育缺位，家长对学生心理状态、学业发展关注不足，家校联动渠道不畅通，难以形成家校共育合力[4]。与此同时，各类资助项目之间缺少顶层统筹规划，资助结构配置存在不均衡，无偿资助、偿还型资助的差异化育人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不同资助项目叠加或遗漏现象偶有发生[16]。

3.4. 技术层面：数字化转型停留在初级阶段，伴随数据伦理与风险隐患

当前国内多数高校已经上线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但多数仅仅实现申请填报、线上审批、材料归档等业务流程线上化，属于业务数字化初级阶段，距离数据驱动、需求导向的智慧资助仍有较大差距[12]。一方面，多源数据融合程度不足，尚未基于多维度信息构建完整学生发展画像；数据更多用于完成行政业务，很少用于挖掘学生真实成长需求，难以支撑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型资助方案[14]。另一方面，部分一线资助管理人员的数据素养有限，对大数据工具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不足，不能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此外数字化转型还伴随风险，部分学校存在过度采集学生信息、数据保管不规范等隐患，带来数据泄露、隐私被侵犯的风险，技术使用边界把握有待进一步明确[12]。

3.5. 评价层面：闭环育人评价机制缺失，重过程投入、轻育人产出

现有高校资助工作考核评估，大多聚焦资助覆盖率、资金到位率、档案完整度、认定流程合规性等过程性、行政性指标，侧重业务管理考核；针对立德树人的实际育人成效，缺少可量化、可操作的评价维度。受助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亲社会行为、学业成长进度、心理健康状态、就业发展质量、社会回馈意识等核心育人产出指标，很难纳入常规考核体系[17]。资助工作缺少“识别-帮扶-发展-评价-反馈优化”完整闭环，评估结果大多用于评优考核，较少反向指导资助项目迭代、认定标准优化、帮扶方案调整[4]。尤筱玥、陈慧怡通过改进 FMEA 模型开展研究发现，资助育人环节存在多类高风险失效模式，但传统评估体系很难识别预警这些潜在风险，制约资助育人质量提升[17]。

4. 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坚持价值引领, 把立德树人贯穿资助业务全流程

第一, 将思想政治教育完整嵌入资助业务全链条, 在困难认定申请、评审公示、勤工助学岗位管理、奖助金发放、励志教育活动各个环节渗透价值引导, 常态化将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劳动教育融入资助体系。依托勤工助学、志愿服务、公益实践等载体, 引导学生厘清受助的权利与责任, 树立自立自强观念, 构建“受助-感恩-回馈”的道德成长链条[13]。第二, 分类发挥不同类型资助项目的德育功能, 扬长避短。发挥无偿奖助学金在培育学生奉献精神方面的优势; 用好国家助学贷款强化契约意识与责任观念培育; 依托勤工助学落实劳动教育, 引导受助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与奋斗观[6]。第三, 高度重视受助学生精神困境, 坚持物质帮扶与心理帮扶并行。常态化开展个体谈心谈话, 严格做好信息保密, 充分保护学生隐私与自尊, 重建受助学生内在主体性, 避免经济帮扶带来标签化伤害, 真正实现物质解困与精神赋能同步推进[3]。

4.2. 完善精准资助运行体系, 优化全链条识别与分类分层帮扶

第一, 打通内外数据壁垒, 推动高校与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政务部门实现安全可控的数据对接; 整合校内教务、学工、后勤消费、图书馆借阅、心理普查等多源数据, 建立动态更新的困难学生数据库[14]。严格执行“大数据初筛+人工核验”工作模式, 大数据结果仅作为线索参考, 绝不直接作为困难认定的唯一依据, 兼顾识别科学性与人文伦理, 保护学生隐私, 规避技术滥用带来的二次伤害[6]。第二, 健全常态化动态调整机制, 每学期开展困难等级复核工作, 建立家庭突发变故应急响应通道, 对遭遇重大变故学生做到及时识别、及时帮扶, 实现困难学生数据库“有进有出”动态管理[6]。第三, 推行分类分层精准施策, 针对不同困难类型、学业基础、心理状态、发展诉求的学生, 定制差异化“发展资助包”, 将经济资助和学业辅导、心理干预、科研实践机会、实习就业资源进行匹配, 由标准化统一帮扶转向个性化精准滴灌, 落实“扶困、扶智、扶志”三位一体的目标。

4.3. 构建多元协同育人生态系统, 凝聚多方育人合力

参照“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资源协同”三维框架, 着力构建政府统筹、高校主导、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生态系统[4]。在校内层面, 落实“三全育人”要求, 破除部门壁垒, 推动学工、教务、就业指导中心、心理中心、各院系、专业课教师协同联动, 把资助育人纳入全员岗位职责清单。辅导员重点做好思想关怀与日常管理, 专业教师提供学业支持, 就业部门强化困难学生就业帮扶, 心理中心做好心理健康干预, 形成校内育人合力[15]。在校外层面, 积极拓展社会资助资源, 引导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资助育人, 改变社会资助“重给钱、轻育人”的现状, 将资金支持和实习岗位、社会实践、职业指导相结合, 充分挖掘社会资助项目的育人价值[14]。完善家校沟通机制, 保护学生隐私前提下搭建适度的家校沟通渠道, 引导困难家庭发挥家庭教育与情感支持功能, 形成家校共育格局[4]。

4.4. 深化数字赋能, 推动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

以智慧教育理念为指引, 推进资助育人由简单业务数字化向智能育人转型, 遵循价值、治理、服务三维转型框架开展建设[9]。一是迭代升级智慧资助平台, 实现申请、审核、动态监测、学生成长档案一体化管理; 依托多源合规数据构建学生发展画像, 挖掘学生差异化发展需求, 为分类帮扶提供客观支撑[14]。二是加强资助管理队伍数字素养专项培训, 提升辅导员、资助管理人员的数据理解、分析与风险识别能力, 提升数据利用的专业化水平[12]。三是筑牢数据安全与伦理底线, 建立健全学生数据采集、存储、调取、使用的制度规范, 明确数据使用边界, 严格保护学生个人隐私, 杜绝过度采集、随意流转泄露学

生信息，做到技术赋能不忘人文底色[6]。同时，应着手探索数据分级授权、算法透明度审查与受助学生申诉救济机制，为智慧资助的可持续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4.5. 健全闭环式评价与风险防控机制，实现以评促建

第一，构建兼顾过程指标与产出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保留资助覆盖率、资金落实、认定程序合规等传统过程指标，新增思想道德表现、学业发展水平、心理健康状况、就业质量、社会回馈行为等育人成效指标；引入模糊 FMEA 等风险分析工具，识别资助育人各个环节高风险点，建立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17]。第二，完善“识别－帮扶－发展－评价－反馈优化”完整闭环机制，将评价结果运用于资助项目优化、认定标准调整、帮扶方案迭代，发挥评价导向作用[4]。适度引入第三方评估参与部分评价工作，弥补内部自评的局限性，提升评价结果客观性。第三，建立受助学生跟踪回访制度，对受助学生开展中长期成长追踪，持续总结实践经验，动态改进资助育人工作，推动高校资助育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

需要指出的是，评价机制的健全本身亦可能伴生新的风险。若过度依赖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可能异化为“指标化育人”的工具理性：高校与资助工作者为迎合考核而将育人工作简化为可测量、可比对的行为表现，受助学生亦可能为满足指标而选择性表现，导致德育目标被工具理性遮蔽，背离立德树人的初衷。为此，成效评价必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保留必要的量化指标以保障评价的可操作性与可比性，同时引入成长叙事、质性观察、学生自评互评等多元评价方式，关注受助学生内在精神成长与主体性发展等难以量化的维度；评价结果的使用亦应保持审慎，主要用于诊断与改进，而非排名与问责，避免评价指标的“指挥棒”异化为育人的束缚。唯有在“以评促建”与“防评异化”之间保持张力，闭环评价机制才能真正服务于资助育人的高质量发展。

5. 结论

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已经远远超越单纯经济救助的范畴，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公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10]。从保障兜底走向发展赋能，是新时代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2]。面对实践场域中存在的理念偏差、精准识别阻滞、协同机制不足、数字化赋能不充分、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多重现实困境，高校应当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统筹物质经济帮扶与精神价值引领，打通多方协同育人壁垒，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同时严守数据伦理与学生隐私底线，健全闭环评价与风险防控机制。唯有兼顾扶困、扶智、扶志，平衡保障功能与发展赋能，才能真正破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帮助广大受助学生成长成才，充分释放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制度优势与育人价值[1]。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属于理论框架建构研究，所提出的“逻辑－困境－路径”分析框架与多维实践路径有待经验证据的进一步检验。未来可选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开展案例研究与追踪调查，检验框架的适用性与路径的实际成效；同时，国外学生资助制度在成本分担、需求识别、资助组合设计等方面的经验亦值得关注，中外学生资助制度的比较研究有待专门开展。

基金项目

攀枝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035200254)。

参考文献

- [1] 张海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助育人的关联与互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48): 97.
- [2] 徐英. 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20): 42-45.

-
- [3] 王燕凝. 从边缘困境到成长护航: 高校资助育人的启示与实践探索——评《岂不怀归: 三和青年调查》[J]. 现代城市研究, 2026, 41(2): 131-132.
- [4] 苑仁慧, 陈红翠. 资助育人视角下大学生协同育人指导手册研究[J]. 出版广角, 2025(S1): 44-47.
- [5] 韩霞, 韩学影, 杨明一. 学生资助政策如何发挥育人实效——基于北京、上海、浙江高校的实证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2): 36-43.
- [6] 李春玲, 高云浩, 邬娜. 高校学生资助如何发挥“立德树人”作用——基于亲社会行为视角的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5, 23(1): 130-153, 191.
- [7] 黄维, 廖小薇, 阳立高, 等. 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2(1): 147-158.
- [8] 张永.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1): 154-159.
- [9] 姜庆华, 袁旭元. 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与图景[J]. 江苏高教, 2024(7): 88-95.
- [10] 任颖.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29): 93.
- [11] 马晓燕. 理解高校资助育人科学内涵的三个维度[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 36(3): 152-155.
- [12] 王静, 唐志文. 新发展阶段高校学生精准资助的价值意蕴、现实境遇与实践向度[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1): 106-111.
- [13] 张珺, 宋杰, 何毅, 等.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学生资助诚信问题研究[J]. 征信, 2024, 42(7): 65-70.
- [14] 武卫兵, 周士权. 中医药院校发展型社会资助育人工作探析——以李时珍中医药教育基金为例[J]. 时珍国医国药, 2022, 33(2): 489-491.
- [15] 温嫦艳. 角色理论视阈下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人员角色重塑——评《高校资助育人的探索与实践》[J]. 当代教育科学, 2022(3): 2.
- [16] 胡艳丽. 高校资助育人长效机制构建——评《高校资助育人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教育学报, 2023(3): 130.
- [17] 尤筱玥, 陈慧怡. 高校资助育人关键风险分析的模型改进[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2(4): 647-654.